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材料

[2021] 第 11 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专题）

2021 年 6 月

目 录

历史大视野下的中共建党	1
怎样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经验与启示.....	17
为什么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21
为什么说中共七大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的启示...	26
百年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及经验（上）...	31
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为什么要摆放孙中山画像?	37
学党史，总书记讲到的伟大精神	40
【伴公汀】看似“高大上”的某些政策，为何最终走向这种结局?	51

历史大视野下的中共建党

章百家 张军峰

中国共产党是 20 世纪初期在国际国内一系列因素综合催促下诞生的。100 年之后，在回溯这个毛泽东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时，我们的视野已更加宽阔，对背景和细节的了解也有更多更准确的认知。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政党政治的出现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 20 世纪之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已十分腐朽，中华民族也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

在中国社会性质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也悄然发生变化，其重要方面是工人阶级的长成、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和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中国的产业工人最初产生于西方列强在华设立的企业和洋务运动的官办企业之中。民族资产阶级则稍后，是从买办、官僚和地主中分化而来。洋务运动派遣留学生和设立专科学校使中国有了最早一批接受西式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

在 20 世纪的头 20 年，随着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中国社会的变迁呈加速之势，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民族

主义逐步形成。这就为即将到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准备了物质、人才和思想基础。

1901年，曾镇压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推行“新政”，其目的是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迟来而不情愿的改革未能改变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却开启了发展民族实业和西式教育的大门。各种工商企业的开办和商会纷纷成立，增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也使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大量新式学堂的兴办，则使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得以形成。这一代知识分子受到中西两种文化的熏陶，怀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前所未有的批判精神。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虽然这场革命在形式上是温和的，而且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三个月就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府所取代，但是，这场革命开辟了20世纪伟大中国革命的时代，其具有的深刻内涵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加彰显。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擎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促进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中华民族的觉醒，激励起一大批志士仁人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行民主而英勇奋斗，从此反动势力再不能建立起巩固的统治。

辛亥革命掀起了中国近代政党政治的第一波浪潮。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登台亮相，过去被专制统治视为洪水猛兽遭到严禁的政党组织竞相成立，各种名目的政纲、宣言遍布报刊，各种“主义”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尽管这时的政党组织五花八门，不少带有会党性质，但中国政党政治的时代毕竟来临了。

除政治方面的变化之外，辛亥革命还加快了中国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判断、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转变。这一系列转变不仅有利于吸引和动员人们关注和参与政治生活，也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视野。

时势潮流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辛亥革命后的 10 年，无论是中国的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形势都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先是袁世凯称帝遭到举国反对；随后，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和混战加剧社会动荡和分裂，同时也使得北洋政府无法对社会实行有效控制。国内政局的动荡，加上相继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文化运动、俄国十月革命、五四爱国运动等重大事件的交互影响和作用，中国先进分子为救国救民进行的探索改变了方向。

纷乱的时局激发人们思索，新文化运动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1915 年 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他认为，要改变中国，必须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一

年后，这本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其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宗旨一目了然。

新文化运动能够蔚成风气，引导潮流，得益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的教育改革。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上任后即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教学方针，实行民主办学，鼓励学术研究，出版刊物和开展社团活动。他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执教。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培育了北大的一代新风，也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自此，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荟萃北大，《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地。随着一批积极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报刊陆续创办，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起来。

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针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政治试验的失败，针对群众思想蒙昧落后，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宣扬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这场运动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文学革命的意义并非限于文化方面。如果没有白话文的流行，外国的新概念、新思想便无法比较准确地译成中文，介绍给国人并为国人所理解。革

新文学与革新政治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得新文化运动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最初曾鼓吹“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然而，惨烈的世界大战使中国人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矛盾，这种制度在国人心目中深受推崇的地位开始动摇。

战争与革命在历史上经常互相衔接。大战后期，首先在俄国发生了两次革命。1917年3月（俄历2月）发生的“二月革命”，推翻了统治俄国达三百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当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又爆发“十月革命”。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的工人群众和士兵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接着，欧洲掀起一场大范围的革命风暴。随后两年，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也高涨起来。

对于俄国二月革命，中国的先进分子认为，这标志着君主制在世界范围内已走到尽头。那时看来，俄国人似乎在走中国的路。8个月后十月革命爆发，但消息传到中国并没有引起舆论界的很大反响。中国思想界正沉浸于新文化运动大潮初起的兴奋之中，一时尚未意识到俄国两次革命各不相同的性质。直到近一年以后，思想敏锐的李大钊发表《法俄革

命之比较观》，中国的先进分子才开始领悟十月革命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然而，在1919年年初举行的巴黎和会上，英、法、美等列强不仅拒绝了中国人民提出的正义要求——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条”等，而且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

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在人民群众中，尤其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激起强烈的愤慨。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到天安门前集会，五四运动就此爆发。从5月初到6月初，这场运动以学生为主。6月5日，上海工人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罢工高潮时达到10多万人。上海商人也举行罢市。工人罢工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和10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使五四爱国运动突破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人民的巨大压力下，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先进分子的“猛醒”，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明显动向是转向社会主义。相当一部分人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也怀疑甚至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社会

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不过，五四时期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等各式各样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思想流派。

当时，绝大多数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但是，这代人有一个可贵的特点是身体力行，勇于尝试新事物。1919年年底，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的一些进步青年兴起工读互助主义的实验活动，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组织互助社，过起“共产主义的生活”，并希望把这种做法逐渐推广到全社会，从而实现“平和的经济革命”。还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美国的劳动共产村的做法，进行“新村”实验。这些实验自然是昙花一现，但对于参与其中的那批进步青年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为他们摒弃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改良主义思想、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国的工具，创造了有利条件。

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于西方工业化中期，它传播到中国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的过程。清末民初，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曾在报刊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作过零

星介绍，但并未引起太多关注。直到五四运动前后，由于国内外一系列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陡然加速，其影响迅速扩大。

李大钊是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1918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三篇文章，热烈赞扬十月革命，指出这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已成为世界历史的潮流。1919年秋，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篇文章表明李大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那段时间已有一批海外中国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除李大钊外，还有李达、李汉俊、杨匏安等，他们都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起到过重要作用。

个人经历对这批先进分子的思想转变也具有重要作用，陈独秀最为典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身处新旧思潮交锋的漩涡，对辛亥革命以来，尤其对北洋军阀统治下中国政治的黑暗有着切身的体会。他对西方列强有过很大的幻想，因此中国外交失败给他的刺激甚大。五四运动中，陈

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在近百日的囚禁之中，他痛定思痛，认识到“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割，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正是由于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和组织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陈独秀出狱后很快就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当中国人对西方列强深感失望之时，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这些承诺后来虽未兑现，但当时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对于扩大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促进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

经过五四运动，此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达200多篇，其中许多是马恩著作的节译。这样集中介绍国外的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实属罕见。与此同时，“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也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心声。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北京，1920年3月，李大钊主持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上海，陈独秀于1920年5月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先进分子建立联系。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一批先进分子相继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除李大钊、陈独秀外，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还有一批年轻人，如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张闻天、向警予等。

经过辛亥革命后十年的积淀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在中国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政党的条件逐渐形成。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恰在此时，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也准备派遣代表来华，以了解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问题。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成为国际共运的中心。借助一战后欧洲和世界各地出现的革命形势，为改变苏

俄政权极其困难的处境，列宁联合 30 多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于 1919 年 3 月发起成立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此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世界上各主要国家的共产党纷纷成立。但不久，欧洲的革命浪潮趋于消退。列宁便越来越把注意力转向远东和中国，寄希望于那里的革命运动。

1920 年，苏俄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派遣使者到中国。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维经斯基。他于四五月间来华，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又经李大钊介绍前往上海与陈独秀见面。通过双方的接触交谈，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俄国革命的情况和苏俄的政策有了具体的了解，维经斯基也初步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随后，维经斯基又与上海其他一些进步社团广泛接触，并向陈独秀提出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建议。

在筹备建党的过程中，陈独秀与维经斯基之间发生过一些分歧。主要是陈独秀坚持建立一个由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党；维经斯基则试图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团体联合在一起，先成立一个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同盟，待时机成熟后再成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党组织，并为此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上海革命局等机构。不过，实际情况表明还是陈独秀的主张更可行。

1920 年 8 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 2 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

产党”，陈独秀为书记。该组织成立后即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1920年10月，北京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地点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三人。此后又陆续发展了一些党员。到1920年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其成员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随后，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两项工作。一项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这时，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已发生分化，出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实业救国等思想的论争。1920年9月，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后，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推动建党工作的开展，并出版了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采取出版报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利用学校讲坛等多种形式，建立并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另一项是深入到工厂、矿山、码头，开展工人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

工人运动结合。这时，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已达到 200 万左右，是支撑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1920 年春，陈独秀到上海后即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也积极开展对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出版工人刊物，利用“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名义创办各种劳动补习学校，结合工人生活和斗争，诉说工人的要求，以通俗的方式传播革命道理，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众中引起广泛共鸣。

由于党的创建活动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各地成立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称“共产党”。从性质和特征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中共一大的召开与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

1921 年 6 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经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联系，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原定在 7 月初召开，后因各地代表难以按时抵达而推迟至 7 月下旬。

7 月 23 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召开。国内各地和旅日党组织共派出 13 名代表参加，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

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 50 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在广东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均因事务繁忙，未能出席会议。7 月 30 日晚，会议因一敌探闯入而立即解散。此后，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中共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这次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但从这时起，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

一年以后，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 12 人，代表全国 195 名党员。党的二大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

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案提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旗帜鲜明地展示了党的先进性。大会通过党的第一个章程，还通过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自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明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选择马列主义，或者说马列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是由于它提供了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思想武器，即开展阶级斗争以实行社会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革命政党。这是当时传入中国的任何其他思想或理论所不具备的。

第二，党的纲领以中国现实的政治需要为依托。虽然从形式上看，中共的纲领受到共产国际的极大影响，但其反映的诉求却完全是中国的。党的最低纲领即现阶段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一最低纲领与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任务具有高度一致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这其实与中国传统的“均贫富”和“大同”思想暗合。

第三，中共在最初的革命活动中就表现出自己鲜明的阶级属性。中共成立之初，党员人数很少，成分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但是，中共却采取了其他任何政党都没有采取过的办法，即深入中国社会底层，与工农结合，发动工农运动。先进的知识精英主动投身和引导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革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上述三个特点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具有长远影响。主要是党的奋斗目标是可以长期坚持的，这一奋斗目标对立志改变中国面貌的先进分子和希望改变自身命运的广大人民群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同时，这一奋斗目标也使中国共产党有理由相信，自己不仅是工人阶级，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者。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和使命感，不畏艰难、前赴后继，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而英勇奋斗。

（来源：党的历史，2021年4月2日）

怎样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经验与启示

王光鑫 陈坚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登上历史舞台，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懈奋斗，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领导革命胜利的丰富经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经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特殊国情，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首要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个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旦被中国人民接受和掌握，就转化成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物质力量。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一条根本性经验。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革命需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控制当时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政权，拥有庞大的反动军队。辛亥革命及以前的救亡运动之所以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革命者孤军奋战，没有广泛发动并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从萌芽开始就被斥为“过激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剿杀。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仅靠中国共产党“千里走单骑”是不行的。毛泽东指出：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有了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就有了胜利。我们的势力越大，胜利的把握就越大。根据革命阶段不同状况，党积极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分化敌对力量，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使敌强我弱的形势得到扭转。大革命和抗日战争两次国共合作，最大限度动员力量共同奋斗，为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1939

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武装斗争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一开始认识不足，结果大量党员和革命群众惨死在反动军阀的屠刀之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论断就是从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党通过武装斗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局面。为了取得武装斗争的胜利，必须建立一支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使“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开始确立。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规定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而把新型人民军队与旧式军队根本区别开来。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人民军队探索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但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导致工人阶级比重很小，绝大多数党员是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也有很多知识分子，还有非劳动者阶层革命分子。同时，党还长期处于农村根据地的斗争环境。如何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

成为迫切问题。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确保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党通过经常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探索出总结历史经验和整党整风的有效手段，不断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左”倾和右倾错误，逐渐走向成熟。中国共产党还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培育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这些优良作风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949年6月，毛泽东在总结经验和历史启示时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支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经过革命锻造和斗争考验，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从开始时的50多名党员，到1949年9月成为一个拥有448.8万多名党员的全国范围内的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胜利，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年4月8日）

为什么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华民族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这一胜利，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当家作主，真正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这是中国人民社会政治地位的根本变化。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

这一胜利，彻底结束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封建割据局面已一去不复返。中国各族人民从此生活在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共同进步的大家庭之中。

这一胜利，实现了近代以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使中华民族一洗百年来所蒙受的奇耻大辱而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国人民结束奴隶般的悲惨生活而走向光明幸福的未来。

这一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了障碍，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 20 世纪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这一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大国里，扫荡了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势力，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既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反帝斗争的胜利信心；也有力地推动了维护国际和平事业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世界和平力量。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别国革命经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式。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把自己国家的人民解放斗争引向胜利发展的道路，就不能拘泥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讲的某些个别论断或制定的行动纲领，而必须从本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出发，与时俱进，因地因事而变，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这个结合是一个历史过程，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为什么说中共七大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战接近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

七大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建立新中国，当时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大会拟定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任务。大会宣布要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把能否解放、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政党政策的根本标准。

七大总结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作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强调三大作风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对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着重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

高标准。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就是我们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党总结中国近代特别是建党以来经验作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决策。中国革命需要马列主义的指导，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是不行的，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推向前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实事求是这个马列主义的真谛，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科学体系。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九个方面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和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

七大选出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在革命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对全党给予及时正确的指导，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大会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七大生动地全面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质。它通过的党的政治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表明党代表着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大会以后，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贯彻七大路线，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的启示

牟 蕾

纵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彪炳史册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不惧风险考验，冲锋在前，带领人民接受了血与火的熔铸淬炼，开辟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严格地说，受动荡局势和战争环境等多重影响，我们党在这一时期并未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但若结合突发事件的定义、历史事实的客观发展进程，我们党对多次“事变”和“事件”的措置，可被视为突发事件应对。例如对卢沟桥事变、西安事变、皖南事变等的处理解决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准备着一切的条件足以应付任何突然事变。这应当是边区党当前工作的基本方针”。诸多类似论述表明，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已经在思考如何在领导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加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也积累了防范化解风险的宝贵经验。

敢于担当。“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在突发事件爆发之时，在国家和人民需要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总是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敢于担当，与人民同甘苦，与时代共命运。面对“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惨绝人寰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屈服，而是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投入战斗。面对长征路上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围追堵截以及党内重大突发危机，中国共产党人克服饥饿、严寒、疾病、分裂等无数困难，取得长征史诗般的胜利。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挑衅和侵略，“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于次日即发出了中国抗战史上、也是二战史上受侵略国家向法西斯国家发表的第一个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直接戳穿其侵华阴谋。面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和平与风险共存的复杂局面，在国民党突然撕毁“双十协定”，悍然挑起内战之际，中国共产党沉着应对，揭穿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立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用铁血忠魂在中华大地上刻下担当与责任的铮铮誓言。

底线思维。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宁可把形势想得更复杂一点，把挑战看得更严峻一些，做好随时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并且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1940年春，皖南事变发生前，党中央就已经对国民党顽固派频繁的反共活动有所警觉。中央多次发出电报，提醒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和实际准备。党中央还提前拟定了两个应对预案，并且分析了可能的发展状况，做了军事、组织以及舆论方面的预警防范。

虽然皖南事变最终还是发生了，但事变前的准备和预判，使我们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1941年2月17日，毛泽东等就皖南事变后的军事方针给彭德怀等发出指示，强调“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极其复杂的斗争中，我们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底线思维，经受了重庆谈判的风险考验，“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进行不懈努力，同时领导解放区人民做好对付全面内战的各种准备，保证了我们党始终处于主动地位。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经验丰富并拥有121万党员的强大政党了，国际国内形势也对我们有利。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仍强调“我们更要准备困难”，“准备吃亏”，并接连列出了17条困难，强调要有“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的“精神准备”。未雨绸缪，喜不忘忧，用实际行动展现出强大的底线思维能力。

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屡遭突发事件，严重时甚至危及生死存亡。之所以能够战胜险阻，转危为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既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们党痛定思痛，逐渐认识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不断改变策略，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九一八事变”后，党积极地与过去一切缺点、错误和各种不正确观念

作无情斗争，加强自身建设。卢沟桥事变前后，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为了彻底清算党内的教条主义特别是主观主义错误，写下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使党能够承担起中流砥柱的使命。皖南事变后，中共在与国民党顽固派坚决斗争的同时，认真检视自身问题，坚决纠正错误，总结血的教训，在国际国内的威望大大提高。

群众路线。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最伟大的力量蕴含于群众之中。在与各种突发风险危机斗争的过程中，党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次斗争都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与拥护。“唤起民众千百万，同心干”，是战胜各种困难的重要法宝。大革命时期，中共就已经广泛地领导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使处于个体状态的社会成员能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合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一次次“围剿”根据地的突然进攻，党紧紧依靠群众，坚信“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带领根据地军民痛击一切来犯之敌。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寇一次次“清乡”“清剿”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中共全力推动民族大觉醒、民众大团结，最终让日本侵略者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国统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等突发事件，中共第一时间揭穿其反动真面目，让血淋淋的悲剧唤醒广大民众，推动爱国

民主运动全面高涨。在解放区，面对国民党的肆意摩擦和突然进犯，我们党领导军民奋起还击，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踊跃“支前”，彰显出人民的力量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

舆论引导。新闻舆论不仅关系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并且关系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已逐渐能够在纷繁动荡的时局中把握舆论方向，使得在多次突发事件后，事件的走向能朝着有利于国家民族利益的方向发展。西安事变后，我们党通过《红色中华》以及人民通讯社等发表文章和评论，披露真相，表达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国难的坚定立场。这一举措有力地回击了国内外一些媒体的虚假宣传，扭转了舆论风向，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同志亲笔题词于《新华日报》，四两拨千斤，穿透了事变的迷雾，荡涤了山城的阴霾。中共中央还特别注意对国际社会的宣传，利用英美策动国际舆论，发动各界人士把皖南事变的真实情况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内战阴谋公之于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

（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4月1日）

百年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及 经验（上）

董振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持之以恒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焕发出旺盛的活力和强大生命力。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三次伟大飞跃

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毛泽东同志有一段生动的论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给当时的中国人民提供了

探索救亡图存的新选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牢牢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在实践中不断运用和发展这一科学的理论，变革着旧中国落后的社会面貌，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三次伟大飞跃。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站起来

中华民族实现由“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第一次伟大飞跃，正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基础上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第一次提出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

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那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正是在那一时期形成的。

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这条道路既不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更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而是符合我国国情、产生于中国革命实践探索、能够保障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正确道路。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国人民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富起来

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第二次伟大飞跃，正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基础上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重大理论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三大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发展的实际，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行动指南。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进

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了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机制障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始终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推进改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屡创新高，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强起来

中华民族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第三次伟大飞跃，正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基础上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只有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强起来，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就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八个方面明确了新时代的总任务、总布局、总战略等内容，并提出了十四条基本方略，是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实践证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已经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变革，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目标。实践也终将证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中国共产党必将完成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必将在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继续前进。

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为什么要摆放孙中山画像？

每逢“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门广场都会竖起孙中山先生的画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殊安排呢？

这背后既有官方节日礼仪活动规范的原因，更重要的则源于全体中华儿女对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的敬仰和崇敬。

孙中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誓言“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在探求救国救民之路的过程中，虽屡经挫折、备尝艰辛，却始终坚持“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

曾有一则流传甚广的轶事：1913年，孙中山讨袁失败，被迫避居日本。当时一些人对革命前途缺乏信心，想问来孙中山的“八字”推算凶吉。

“难道我的‘八字’不好，就不要革命了？”孙中山很生气，说：“干脆对你们讲明我的‘八字’吧：打倒军阀，革命到底！”见来人愣住说不出话，他又接着说道，“我也送你们个‘八字’：百折不挠，挽救中华！”

由此故事，可以一窥他对于“振兴中华”理想的矢志不移、无比坚定，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个伟大革命者的英雄气概和执着追求。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自己作为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1956年孙中山90周年诞辰之时，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由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孙中山的画像就被摆放在天安门广场。20世纪50年代开始，每逢“五一”“十一”都会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竖起孙中山像。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孙中山有着很高的评价，将孙中山的伟大历史功绩概括为“一是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二是开创国共合作，导致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认为三民主义纲领、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奋斗精神是孙中山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是“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孙中山生前，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支持孙中山先生的事业；在他身后，中国共产党人忠实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继续前进，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曾为他心目中的未来中国勾画建设蓝图。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伟大飞跃，创造出的许多成就远远超出了孙中山先生的设想。今天，重要节日时在天安门广场摆放中山先生画像，是缅怀和致敬，更是告慰与自励。

（来源：“共产党员”，2021年4月10日）

学党史，总书记讲到的伟大精神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共产党历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入总结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阐明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这些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论中国共产党历史》这部专题文集，收入总书记2012年11月29日至2020年11月24日期间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文稿40篇。

结合正在全党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总书记讲到的伟大精神，一起学习！

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山东考察时的讲话

山东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传统，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希望大家发扬光荣传统，总结实践经验，把党的建设抓得更扎实、更有效。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山东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生命有限，很多英雄模范人物崇高精神的形成过程也是有限的，但形成了一种宝贵精神财富，是一个永恒的定格。焦裕禄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红旗渠精神等都是共存的。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有这样的精神构成其强大精神力量，这样的精神无论时代发展到哪一步都不会过时。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延安是革命圣地。延安时期是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时期。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五日在陕西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斗争的伟大实践，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抉择、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成长具有关键意义。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在江西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弘扬井冈山精神，要结合党的建设工作实际，同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统一起来，同弘扬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统一起来，不唱高调，不讲空话，实打实做。

——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在江西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黑龙江有不少有利条件，东北抗联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激励了几代人。今天，我们仍然要用这些精神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引导他们发扬优良传统，在全社会带头弘扬新风正气。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在黑龙江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

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在浙江工作期间，我曾经把“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在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的讲话

王杰“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这“三不伸手”是一面镜子，共产党员都要好好照照这面镜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要成为革命军人的座右铭。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在视察第七十一集团军时的讲话

创办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方法论，是经过实践检验推进改革开放行之有效的办法。先行先试是经济特区的一项重要职责，目的是探索改革开放的实现路径和实现形式，为全国改革开放探路开路。只有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

路，才能收获别样的风景。经济特区要勇于扛起历史责任，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按照国家发展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始终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在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大胆探索，为全国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三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更多时代楷模。我们既要学习雷锋的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体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东北三省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的讲话

四十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以科学理论引路指向，以正确舆论凝心聚力，以先进文化塑造灵魂，以优秀作品鼓舞斗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广为弘扬，时代楷模、英雄模范不断涌现，文化艺术日益繁荣，网信事业快速发展，全民族理想信念和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

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解放战争时期，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七日在重庆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五四运动时，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一批爱国青年挺身而出，全国民众奋起抗争，誓言“国土不可断送、人民不可低头”，奏响了浩气长存的爱国主义壮歌。

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神。这些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江西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永葆初心，才能走得远。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地之一。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陈潭秋等亲自指导了这里的建党活动，徐向前、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留下了战斗足迹。这里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走出了三百四十多位将军，二七大罢工影响深远，大别山“二十八年红旗不倒”，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新县是“将军的摇篮”，中原局旧址确山竹沟被称为“小延安”，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在河南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

要用延安精神净化政治生态。政治生态好，干部队伍就会风清气正、心齐气顺，社会风气就会积极向上、充满正能

量。政治生态不好，各种歪风邪气就会冒出来。毛主席当年概括了延安的“十个没有”。“延安作风”和“西安作风”的巨大反差让许多民主人士感叹：“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在陕西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山西也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是抗日战争主战场之一，建立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闻名中外，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在山西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不惰者，众善之师也。”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培育形成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

神，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仍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荆棘坎坷。我们要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敢于斗争，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来源：《学习时报》，2021年2月22日）

【伴公汀】看似“高大上”的某些政策， 为何最终走向这种结局？

抓落实，必须层层传导，形成一个实际奏效的闭环，而不能层层损耗，更不能凭空“画饼”。有穿透力的落实，才能解决问题，才算真正意义上的落实。这既要求各环节展现强大的执行力，也需要在决策部署伊始就做好设计，用“通透”的决策带出“穿透”的落实。

有穿透力，决策安排必须具体化，要以务实为导向。有些事，看上去光鲜，听上去“高大上”，却不管用、不解渴、不过瘾，甚至纯粹停留于系统内、部门内的自我循环。有些工作部署，看似“大而全”，实则“空对空”，也触及不到要害问题，结果多半流于形式、停留于空谈。

工作越具体，任务就越深化。重大战略的落实必须环环相扣，战略任务化、任务项目化、项目责任化，有具体的推进抓手和评估机制，及时测量绩效，及时作出调整。想清楚的事要“谋定快动”，没有完全想清楚，或有特殊难度的，同样应投身具体实践，并高度重视具体实践中暴露的矛盾问题，不断进行动态优化。

抓落实的过程，不可能没有矛盾，难免遭遇意见分歧、利益纠葛。有穿透力的落实，必须穿透这些矛盾纠葛，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和观念壁垒、利益藩篱。而要做到这点，政策设计是否有棱角，显得至关重要。

制定政策的初衷就是直接高效地解决问题，这就必须直击要害、有的放矢，给出清晰而精准的改革目标和路径。如果左右逢源、四平八稳、隔靴搔痒，也失去了政策制定的意义，非但无法传递明确导向，更会给基层执行者带来不必要的困惑干扰，并在客观上增加冗余的行政成本。

有棱有角的政策，归根到底检验的还是制定者的担当精神。只要符合中央要求，符合基层实际，顺应群众需求，就应当多一些“闯”和“创”的探索，多一些打破陈规的尝试；对于基层迫切提出的改革需求、创新期待，更应通过富有针对性、务实管用的政策措施予以回应。

“为改革者撑腰，为担当者负责”，不是一句空话，就体现在具体的政策设计里。方向是否明确、信号是否清晰，也正检验着我们是否真正解放思想，是否真的富于创造、敢于担当。

（来源：“伴公汀”，2021年4月11日）